

中国城市化研究二十五年

陈成文, 刘剑玲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二十五年来中国城市化研究主要围绕在城市化的涵义、模式、发展方针以及滞后于经济发展原因等方面展开讨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 从而使城市化研究走向了深入。

关键词: 城市化研究; 回顾

中图分类号: C912. 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5-0564-06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和结果, 城市化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 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创新的载体。欧美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相继完成城市化过程, 其城市化平均水平普遍超过 70%, 发达国家步入后城市化阶段之后, 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目前, 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达到 45%,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我国城市化年平均增长速度达 3.45%, 人口城市化水平从 1990 年的 26.23%^[1] 提高到 2002 年的 39.1%^[2]。但跟现代化标准仍有较大差距。据预测, 到 2020 年, 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超过 50%, 这意味着在未来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 中国将有 3 亿多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 从而将导致我国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国内学者对中国城市化的系统研究, 大约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之前的研究并没有正面提出过“城市化”问题, 有关研究也是凤毛麟角。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的城市化得到迅速发展, 人们开始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城市化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中的重大作用。自 1979 年以来, 随着系统资料的增多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中国城市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 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整体上还比较落后。众多现存矛盾和问题的解决, 都将得益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回顾城市化研究的历史历程, 正确认识城市化的基本内涵, 理清城市化研究的思想脉络, 揭示理论工作者对城市化所作的思想贡献, 探讨城市研究的未来趋势, 对深化改革、加速城市化和促

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发展,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笔者初步统计, 从 1982 年到 2004 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共全文复印了 51 篇有关城市化问题的文章。从 1982 年到 2003 年的 20 多年间, 国内各种学术刊物共发表了有关“城市化”的文章 5255 篇。这些论文涉及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人类学、历史学、生态学和旅游学等多种学科。“城市化的界定及其内涵”和“我国城市化的道路及影响城市化的相关制度”一直是这一领域中最重要论题。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很多, 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问题本身引人注目以外, 我国城市发展方针, 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结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区地域的差异性等也是重要的背景。

通过对人大复印资料 1982—2003 年所有有关城市化论文的内容分析, 笔者认为二十多年来我国城市化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79—1993 年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大部分文章认为我国城市化是中国农村的城市化,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要走农村城镇化道路。自 1983 年费孝通先生提出“小城镇, 大问题”以来, 以城市规模划分城市化道路的讨论贯穿整个 80 年代, 到 90 年代中期, 积极发展小城镇的观点被政府写进城镇发展规划, 而且变成了事实。1994—2000 年为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论文内容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学术界对城市化道路的探讨发生重大变化: 由小城镇化模式转向中等城市模式、大城市模式、大中小城市均衡论模式和多元城市化模式。

收稿日期: 2004-06-09

作者简介: 陈成文(1966-), 男, 湖南隆回人,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社会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应用社会学。

这一现象源于第一阶段新兴的城镇没有出现预期的集聚功能,经济效益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环境问题恶化,出现了城市建设中的“乡土病”,同时也表明各界人士对我国城市化比前一阶段有了更为全面、更为理性、更为经济、更有前瞻性的理解。这一阶段末,构建与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多元城市化模式为多数学术界人士所赞同。另一个突出变化是对制约城市化进程的相关制度的探讨增加。2001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期间论文内容所涉及的学科最为广泛,特别是出现了一批从生态理念、旅游学、可持续发展等角度研究的城市化论文,以及一批主要涉及城市与城市化健康发展相关制度改革和对城市化研究理论状况进行评述的文章。

一、关于城市化的概念

城市化一词的出现至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然而,由于城市化研究的多学科性和城市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对城市化内涵的界定,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同学科因研究角度不同,对城市化的理解也有所差异。经济学家通常从经济与城市(镇)的关系出发,强调城市化是经济结构的转变即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化;地理学家特别强调城市化是一个地域空间过程,强调城乡经济和人文关系的变化,认为城市(镇)是地域上各种活动的中枢,城市化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的全过程;社会学家以社群网(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的密度、深度和广度作为研究城市(镇)的对象,强调社会生活方式的主体从乡村向城市(镇)转化;人口学家研究城市化,主要是观察城市(镇)人口数量的增长变化情况,城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提高情况,城市(镇)人口规范的分布及其变动等,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经济、社会原因与后果;人类学家则以社会规范为中心,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即由乡村生活方式转为城市(镇)生活方式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就是人类从区域文明向世界文明过渡中的社会经济现象^[3]。

尽管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城市化包括人口流动、地域景观、经济领域、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内涵,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内涵也在发生变化。纵观各学科对城市化的不同理解,概括起来主

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1、“人口城市化”观点。这种观点将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镇)人口或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杨张乔认为,城市化首先是一种人口现象,即人口的集中,确立城市化的基本要素是人口的城市化率,各国对于城市化水平的测定,皆以城市人口及其在全部人口中的比率作为主要依据^[4]。钟莱魁认为,城市是农业生产率提高,出现商品经济后的产物。所谓城市化,其具体表现是人口逐渐脱离农业,向某一合适的空间集中,并从事除农业以外的其它职业,导致城市的出现和城市数量的增多与质量的提高^[5]。徐江敏认为,所谓城市化,指的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化,衡量某个国家的城市测量水平,重要的指标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6]。

2、“空间城市化”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指一定地域内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不断变化的过程。城市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的城市化、非农产业的城市化、地域的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四个方面。胡必亮认为,我们可以将本世纪的城市化概括为两种不同的形态,即盛行于本世纪前期的以人口和其它资源向城市高度集中的城市化形态和出现于本世纪后期的以人口和其它资源在某一特定区域内通过相对分散配置而推进到大的都市区而产生与发展的城市化形态,也就是建立在单一城市集中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形态与建立在区域综合协调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形态^[7]。

3、“乡村城市化”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乡村与城市(镇)的对立和差距,认为城市化是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镇)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周大鸣、郭正林把乡村城市化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口增多;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转变;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变;四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随着乡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日益渗透到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从保守、落后、守成转为开放、先进和进取,人们的文化水平总体素质都得到提高^[8,9]。税尚楠、吴希翎认为,所谓乡村城市化,就是城市和乡村融合,改变乡村落后状态,乡村和城市协同发展的过程^[10]。曹晓峰、杨丽、

蔡加福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历史范畴,是指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转变为先进的城市社会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大部分农业人口脱离农业,逐步向城镇集聚,使城镇人口的比重和非农产值的比重逐渐增大;二是乡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向城市转变,即乡村的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收入水平及结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与城市日渐接近,趋于同一,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现农村的城市化^[11,12]。

仲小敏认为,城市化的(Urbanization)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变农村地域为城市地域的过程,即城市化的数量过程;另一方面是指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的地域扩散过程,即城市化的质量过程。城市化的数量过程和质量过程是城市化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有数量过程而没有质量过程,即进入城市或被划入城市化的人口没有被城市文明所同化,不能算真正的城市化;只有质量过程而没有数量过程,即已接受城市文明的人仍被当作农村人口对待,也会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顺利实现。另外,城市化不仅包括农村人口和农村地域向城市转化的过程,即农村城市化,同时也应包括城市自身的不断完善过程,即城市内涵化^[13]。

周毅认为,城市化实质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受众多因素影响的、极其复杂多变的系统转化过程,它包括硬件结构和软件结构两大系统的更替与提升,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全面转型和变迁的过程。城市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镇)集中的聚集过程,而且是城市(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以及城市(镇)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渗透的过程。城市化过程既是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过程,也是广大农村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极大提高,逐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消除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的过程^[3]。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除城市化之外,农村城镇化、城市现代化以及城乡一体化等相关概念也都在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得到广泛运用。

二、关于中国城市化的道路

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讨论,我国的专家学者

先后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1、小城镇论。其主要观点是,为了避免出现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城市发展而乡村凋敝,发展中国家大城市过度城市化的现象,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国情,中国城市应大力发展小城镇。因为小城镇发展起来后,可以起到蓄水池的作用,将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留在当地,这样既可减轻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减少社会震荡,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又可发展乡村的城市化,振兴农村经济,以此实现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14]。

此派代表人物为费孝通先生。从1982年到1986年,在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下,江苏省成立了小城镇研究会,有计划地开展小城镇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绩^[15]。他还首次提出“发展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等概念。自1983年费老先生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以后,关于小城镇的讨论,一直持续了十几年。

郑宇寒提出:“发展小城镇,走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16]。庞道沐指出,“小城镇的大作用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财物等的集聚功能;对剩余劳动力、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调蓄功能;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辐射功能和社会化功能”^[17]。在80年代,还出现了更为极端的观点,即集镇化论,这种观点认为“应建立起一个面宽量大的集镇网络,使农村地区数以万计的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乡村集镇化是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一条独特道路”^[18]。这种观点作为小城镇观点的一种极端化的发展,可以说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如邹农俭还撰写了《集镇社会学》一书。

2、中等城市论。此种观点认为,“中等城市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中心,数量多,分布均衡,是联系广大农村和大小城市的桥梁,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可塑性大,社会问题少。因此,发展中等城市在我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宋书伟提出,“走西方发展大城市的道路,一是客观条件不允许,二是容易出现‘现代城市病’;在农村就地实现城市化,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惰性太强,阻力太大,同时自然条件也不允许。采取中间突破带两头的办法——直接有计划地建设和发展中等城市(20—50万人),吸引广大农村和大城市的人力与物力向它转移集中,才能解决上述问题”^[14]。此种观点,既反对小城镇论,也反对大城市论,在中国城市化道路的讨论中可谓独树一帜。

3、大城市论。此观点认为,人口向城市集中,尤其是向大城市集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把大城市发展作为城市化的重点,就不可能带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此种观点还认为,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只能使工业像一棵“长不大的小老树”,农村中大多数剩余人口的出路也主要是农民自己兴建的大中城市。有的学者认为,“能够把中国广大农民整合到大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才是正确的……从而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大城市发展的道路”^[2]。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城市化发展滞后,因而发展大城市具有规模效益^[2]。有的学者认为,发展的大城市为重心的城市化才会具有更好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效益。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已经出现了隐形的超大城市^[2]。显然,这种观点是针对小城镇论而来的。理由其一是大城市发展是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规律,中国不可能例外;其二是把小城镇发展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道路或唯一道路是“危险的”,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而且易造成污染的扩散、工业经济的停滞不前等后果。

4、均衡发展论。又称城市体系网络论。其主要观点是,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建立以大城市为领导,以中等城市为骨干,以各类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网络系统^[4]。孙常敏、李珍刚、陈为邦、胡必亮等认为应走一条建立在区域综合发展基础之上的城市化道路。他们认为所谓区域协调发展,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完善城—镇—乡建设体系,以及合理地配置好各类不同规模的城市结构,以形成合理的城市等级规模序列。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有机地配置好城、镇、乡的结构体系,缺什么就补充什么,发展什么;对于区域内的大、中、小城市发展而言,也是从结构合理化角度考虑,哪一层次发展不足,就补足哪一层次,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大城市或是发展小城镇。他们认为,脱离区域发展结构合理化要求而孤立地提这些建议和口号,其积极意义极其有限的,弄得不好,反而会形成新的城乡结构不合理、城市结构体系不合理等方面的问题^[19~21]。显然,均衡发展论与前几种观点有所不同,它是从城市体系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城市化模式的,而前几种观点的讨论,则是在城市化体系之下,围绕中国现阶段首先发展哪种规模的城市为焦点展开的。而其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以城市规模作为讨论的出发点。

5、多元模式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人

多地广,地域差异性大,商品经济不发达,工业化水平低,不可能采取单一战略模式去解决城市化问题,而应采取“多元化、非均衡、逐渐递推、综合发展”的战略。所谓多元化,就是指目标模式的多样化;非均衡是指各期主攻方向不一,各有侧重;逐级递推是指实现战略的阶段性;综合发展则是就效益而言,近期以经济效益为主,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中期以社会效益为主,远期以生态效益为主^[22]。

仲小敏认为,多元城市化道路模式包含区域多元化、形式多元化两层含义,即东部地区以内涵式城市化和网络式城市化为主,走大中小城市并举的区域城镇体系发展模式;西部地区实行外延式城市化和据点式城市化为主;中部地区选择内涵式城市化与外延式城市化相结合、据点式与网络式相结合的道路^[13]。

唐若兰认为,注重大城市的培育和发展在我国今后的城市化战略中应占重要的分量,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各地区城市化的阶段性差异,也不应忽视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发展。具体说来,我国应走积极培育大城市、特大城市,不断提升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的多元化城市化道路^[23]。

李强认为,与发达国家城市演进过程相对,中国目前的城市化面临着三个困境:其一是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需要在短期内解决长期积累的问题,会带来新的发展不平衡;其二,地区之间差异性大,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城市化的第二阶段,而欠发达地区还在第一阶段,政策上难以统一;其三,中国人口压力大。城市化不仅面临着基础设施的建设难的问题,还意味着数亿人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因此,在城市化道路战略上,应该多种模式并存^[24]。

三、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方针

早在60年代,毛泽东同志对我国城市化发展建设方针提出过重要意见:城市大了不好,要多搞小城镇;1978年中央提出控制大城市,多搞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思想;1980年,全国城市工作规划会议制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小城镇论观点可认为主要是源于此。但实践中人们对这一方针在认识上存在一定模糊。“控制大城市”是不是不搞大城市的发展?“多搞小城镇”是否意味着小城镇发展越多越好,其它城

市就不发展了?为此,1980年10月和1986年12月的全国城市规划会议明确指出: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这一方针得到了国务院批准,并付诸实施。经过几年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各种原因,城市化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方面,大城市规模没有控制住;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小城镇在发展中资源浪费现象普遍,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这已成为主张发展大中城市、否定小城镇发展理论的主要依据;同时,区域间城市发展水平、发展差距在扩大。因此,1990年,国家在《城市规划法》中将上述方针修改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多元化模式由此产生。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发展方针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对指导我国城市发展、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承认,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方针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随着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战略逐渐成为全球的重要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适当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发展大城市的卫星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并同时进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组织城乡综合开发与建设。”这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方针,也将成为指导中国未来城市化道路的基本准则。

四、关于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原因

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其原因也有某些不同。一般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高资金重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影响;二是城乡“隔绝”的政策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

陈金永提出了“工业化与城市偏爱说”(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 biased Approach)。他认为,中国的“不足城市化”过程,可以用社会主义对工业偏爱的发展逻辑来加以阐释。中国在1979年之前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与前苏联的模式相当一致,偏向发展工业。因此,为了获得工业投资的资金,中国政府通过计划经济下的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策略地把农村的经济积累转移到城市工业中。同时,通过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把农村迁移人口阻隔在城市之外,以保证现有城市人口对城市现有基础设施最

低消费需求和大型国有企业所在地(通常为城市)的政治安全。由于过分偏重于工业发展,农业和城市第三产业得不到相应发展,从而一方面降低了农业对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城市增长的乘数效应。其结果是,中国城乡差距拉大,城市化发展缓慢^[25]。

改革开放给中国城市化发展带来了转折性影响。从统计上来看,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基本上保持了与工业化的同步发展,但由于那些乡村迁入人口并没有获得城市常住户籍,不能真正享受城市各种社会福利,常被视为“二等公民”,因而,户籍制度成了中国城市化的瓶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革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成为城市化研究的焦点之一。

田鸣指出,中国的户籍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渗透远远超过了户籍制度的本身,成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象征。户籍管理制度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城乡社会经济关系的同时,客观上也维持着城乡封闭格局和城乡差别,束缚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制约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26]。

栗正文指出城乡间现存的主要壁垒是户籍管理制度,可从更具根本性的利益关系上看,以供给制、配制福利化为特征的消费制度,才是旧体制的主要维系力量。城市要扩大,仅有空间还不够,还需要消除厚城市薄农村、挖农村以补城市的体制特征,通过价格、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农村的市场地位,并相应改革与旧的城乡格局相关联的福利型消费制度,使城市机械人口的增加不再是城市的包袱,而变为财源。大中城市无需再以户籍制度严控人口机械增长,城市结构将依靠经济机制的调节趋于合理化。有固定收入固定住所的农民应被允许迁居城市^[27]。

张锐指出,中国加速城市化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要重点解决农民身份管理体制。具体说来:一是要拆除各种阻止落户的禁令,除了对那些人口过度膨胀的部分大城市应实行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外,一般不再设置行政禁令,主要通过经济措施调节人口迁移;二是要进行户籍制度相关的财产制度、分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城市制度的配套改革,实行劳动收入货币化、生产资料和产权商品化及福利保障社会化,剥离户口与特权利益;三是要允许户口关系随人身一致流动,随走随迁随落,并依法接受管理;四是为避免户籍制度改革所引起的社会震荡,可在完全放开农村县城和中心镇户口的同时,在大中城市实行“绿卡制”,对在大中城市实际已居住五年以上,拥有房屋产权和稳定的工作职业的发放“绿

卡”,使持卡者在申请工商车辆驾驶证照、经营摊位和柜台子女入托入学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28]。

胡必亮认为,县及县级以下小城镇户籍制度应完全放开,消除任何通过行政手段继续控制农民进入小城镇的做法,进镇农民工完全不应该被要求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因为他们已经支付了额外的进镇成本。是否转让他们的土地,应自愿选择^[7]。

李强指出,持续增长的人口流动,对已有的城市化政策和它的瓶颈——户籍制度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并且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制度,它强调后天努力的产权、文凭技术证书已逐渐取代了户籍制度的维护秩序功能^[24]。

参考文献:

- [1] 陈剑,夏沁芳. 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03, (2): 30-32.
- [2] 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式[J]. 经济研究, 2003, (8): 3-12.
- [3] 周毅. 城市化释义[J]. 锦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3, (9): 96-107.
- [4] 杨张乔. 我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社会问题[J]. 浙江学刊, 1998, (5): 44-49.
- [5] 钟荣魁. 中外‘城市化’概术观[J]. 学习与实践, 1998, (10): 47-51, 62.
- [6] 徐江敏. 中国城市化的程度和发展[J]. 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0, (4): 25-30.
- [7] 胡必亮. 关于城市化与小城镇的几个问题[J]. 唯实, 2000, (6): 10-14.
- [8] 周大鸣, 郭正林. 论中国的乡村都市化[J]. 社会科学战线, 1996, (5): 100-108.
- [9] 周大鸣. 乡村都市化—农村未来变适的方向[J]. 社会学, 2000,

(11): 25-32.

- [10] 税尚楠, 吴希翎. 讨论我国的乡村城市化道路[J]. 经济地理, 1984, (1): 33-39.
- [11] 曹晓峰, 杨丽. 浅析城乡关系与小城镇建设[J]. 社会科学辑刊, 1997, (4): 37-42.
- [12] 蔡加福. 1949-1995 我国城市化不同阶段的经济结构特征[J]. 理论学习月刊, 1997, (7): 26-28.
- [13] 仲小敏. 2000 年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讨论[J]. 科学·经济·社会, 2000, (1): 38-42.
- [14] 王颖. 城市发展的回顾与前瞻[J]. 社会学研究, 2000, (1): 65-68.
- [15] 费孝通. 小城镇·大问题[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
- [16] 郑宇寒. 试论小城镇[J]. 中国社会科学, 1983, (4): 18-22.
- [17] 庞道沐. 做好小城镇这篇“大文章”[J]. 湖南社会科学, 1992, (2): 24-28.
- [18] 陈湘柯. 应区分集镇与城市化[J]. 中国社会科学, 1984, (4): 160.
- [19] 孙常敏. 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与城市化发展[J]. 上海社会科学, 1998, (4): 135-144.
- [20] 李珍刚. 建国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回顾与前瞻[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8, (4): 72-75.
- [21] 陈为邦. 城市思想与城市化[J]. 城市发展研究, 2003, (3): 1-8.
- [22] 温铁军.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与相关制度问题[J]. 开放导报, 2000, (5): 21-23.
- [23] 唐若兰. 发展经济学对城市化作用的新认识及其启示[J]. 探索, 2003, (5): 55-57.
- [24] 李强. 当前我国城市化和流动人口的几个理论问题[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2, (1): 61-67.
- [25] 薛凤施, 蔡建明. 研究中国城市化理论学派述评[J]. 地理研究, 1998, (6): 208-216.
- [26] 田鸣. 中国户籍制度下的城乡差别与劳动就业[J]. 内蒙古社会科学·经济社会版, 1991, (5): 81-86.
- [27] 栗正文. 我国城市化历史进程的省市及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探讨[J]. 战略与管理, 1994, (6): 64-72.
- [28] 张锐. 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 世纪之交的战略构建[J]. 人文杂志, 1995, (3): 49-55.

The twenty-five years study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CHEN Cheng-wen, LIU Jian-ling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Urbanization research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focuses in academic circles since sociology was rebuilt in China in 1979. 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Chinese urbanization research history in the past 25 years shows that the academia is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such aspects as the implication, the model, the developing policy, and the reasons of lagging behind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 on. Different scholars put forward different view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all of which deepens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Key words: urbanization research; review

[编辑: 颜关明]